

思想驱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读后

高江涛



最近四川大学查晓英教授出版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一书，该书尽管是2014年版本基础上的增订本，但读来仍然受益匪浅。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加强中国考古学阐释与研究方面的工作，特意设立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项目。按照经验和学科训练，考古学史应该主要由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所写，但在中国只有少数的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考古学史，其中关注考古学思想史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收到该书，如饥似渴拜读之后确有谈谈学习心得的想法。

本书讨论的中国考古学在时间上是中国史学分期以1919年和1949年为界划分近代、现代、当代中的“现代”。大家知道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筚路蓝缕”期。该书使我们对传统金石学如何向现代科学考古这一充满思想史的转变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我们看到，1926年当李济先生开启他著名的晋南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时，梁启超正在接待瑞典皇太子欢迎会上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的演讲，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总结与思考。尽管限于时代桎梏，他所言“中国考古学”实际上更多是指传统的“金石学”或“古器物学”内涵，但令人玩味的是梁启超明确地指出了要向发掘和改进方法的方向上走。梁启超的“掘地”指向和李济先生“考古调查”实操无疑反映了“近代”转入“现代”后在新思想影响下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便是走向田野的考古发掘与调查。

对于中国考古学思想史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其研究与阐释的难度也是非常明显的。谁就难在“思想”二字，相关叙事显然属于专门的思想史领域，而该书却充满了思想史特点。新史学兴起后的影是深入的，疑古思潮正是这种深入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出彩的注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逐渐接受考古，正是有赖于疑古造就的古史“空洞”。夏鼐先生曾说，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有赖于五四运动后形成的疑古思潮。而这个时代现在看来似乎也形成中国考古学早期异常热闹的考古潮流。众多的“考古机构”如“地质调查所”“古迹古物调查及考古学会”“史语所考古”以及“清华早期考古”等，它们的历史演变与复杂关系及纠葛不仅被该书清晰梳理，更是叙述生动有趣。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兴起于此时的这些“考古机构”及其相关考古工作，可谓是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中国考古人已经逐渐建立了将田野工作视为考古学的核心和“材料为王”的思想理念。早在1903年，蒋智由就批评近代金石学及古器物学特征的“中国之考古学”只知道在纸片上打官司。1929年李济先生接手安阳发掘后，强调“现代的考古学家经过十数年的严格训练，方能勤勤持铲，去田野工作”。无论是李济的“荷锄持铲”，还是1931年创办黄花考古学院的谢英伯的“锹的考古学”，都赋予考古学“田野”的学科特征。1934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刘耀（尹达先生）甚至专门详细讲述了考古工作的三个过程，调查、发掘和整理的考古工作三阶段分法沿用至今。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

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成为“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虽然该书不涉1949年以后之中国考古学，但在它爬梳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思想谱系基础上，我们对当代考古学似乎也有了启发性的思考。这本有关中国现代考古学“思想”谱系的书恰恰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系统性研究的极度匮乏。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中国确实存在“重实践”而“轻理论”的现象，有着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以及相关成果，然而相对缺乏理论性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思考之上的对百年考古学历史从思想发展和学科实践角度的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简言之，有关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方面或内涵的研究，用“乏善可陈”虽有些过，但也确为现实，不仅论文整体寥寥，相关专著更是罕见。回顾并概括以往有关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外学者有一定的考古学思想史方面专著及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将之翻译后国内再出版，如陈淳先生翻译的布鲁斯·G·特里格（Bruce G.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或者国外学者在相关专著或考古学理论研究中涉及部分考古学思想的内容。第二，国内学者虽没有专门的整体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专著或论文等成果中涉及某一阶段学科史、某一角度或分支学科史，某一考古学家、某一考古重大事件等思想史内涵的论述或研究。查晓英这本书就是对于中国考古学初期的那段学科建立早期的思想谱系的系统勾勒和阐释研究。此外，还有徐坚对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多元图景的揭示和中国考古学传统的阐释等（《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旻对考古学家徐旭生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影响作了专题探讨等（《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2019年第6期）。第三，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但考古学思想史又明显不同于考古学史。以往有关中国考古学史研究和论述，或不重视思想史的深挖或阐释，或将考古学史的研究误认为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内涵，或作了一些颇具思想哲理性的发展历程的论述而不明属于思想史方面的探索。正像考古发现的编年叙事、研究历程的回顾、成果的述论等属于考古学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不是考古学史本身一样，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甚至需要从基本的学科理论或体系开始相关研究工作。

当然，对于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难度之大是十分明显的。迄今中国考古存在大量发掘资料和汗牛充栋量的基础研究文章，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却相对缺乏可资参考的系统性的已有成果，这是第一位的难点。同样地，在前述丰硕的基础性成果之上爬梳、总结、提炼出中国考古学的思想发展体系，是问题关键的同时，更是重点上的难点所在。作为一个学科，考古学也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实践性学科，也就是说考古学的研究或阐释是离不开它所处

的时代历史背景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体制显然在考古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正是考古学思想史的重要评估和思考因素。因此，一定程度上，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更是如此。不仅要关注考古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和学术背景，更要关注思想的传播以及促进其不断发展壮大完善完备的状态和内在原因。这是中国思想史在实际研究和操作过程中，包括在知识创新和应用创新中必然遇到的另一个难点问题。

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学术传统，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实证主义，都过多地强调“无证不信”的实用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技艺，重材料、轻理论；重“释形知意”，轻“理性阐释”，是客观实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避免将对“史”的研究做成中国考古发现的编年史、研究的回顾史、成果的述论史；注重研究范式和阐释方法的阶段性转变方面的探索，而非简单的年代排序式的陈述。有鉴于此，结合百余年学科研究成果，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是考古学史视域下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将中国考古学的思想观念发展的过去与现在置于中国百余年考古学史的大背景和内在的角度撰写。探讨从“疑古”到“考古”以至“信古”的演进历程和生成逻辑。其中涉及“二重证据”法的兴起、“考古学重建古史”等思潮。二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实践和现代性。探索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演进脉络和思想指导历程，阐释考古学的中国化与本土化如“区系类型”理论问题，地层学与类型的复杂实践，包括过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现状等。三是中国考古学模糊的学派和固有传统。考古学虽属近现代学东渐之物，但中国学术仍有考据传统与证史传统。尝试厘清中国考古学在发展历程中的证经补史与重构历史的两大研究范式或阐释方式的辅成融合过程，进一步考察中国考古学构建的中国历史演进历程。四是是中国考古学思想观念发展的倾向。探讨作为文化与历史的中国考古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的中国考古学，作为民族探源的中国考古学等历史趋势和现实性。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构建。深入阐释考古学在中国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独特推动力和功用；探索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对文明的重构与中国现代文明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今天的中国考古学除了科学发掘、科技分析和阐释体系不断发展之外，对其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和自觉，显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成熟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中国考古学如何在世界考古学发展大背景下、中国传统人文体系、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和新时代思想体系中营造中国特色的考古思想观念，并以诠释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古今之变，这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未来很长时间应该推进的重要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增订版）

作者：查晓英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十几年前，我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充任副总编辑一职，分管的第一编辑室以策划出版学术著作为主要工作方向。在退休副总编辑张弦生编审的指导下，曾经拟订了一个宏大的出版规划：对近代以来河南籍著名学者（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加以搜集整理，出版一套类似于“近代豫籍社科名家全集”的系列丛书。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想法大概是受到了河南人民出版社为冯友兰先生出版的《三松堂全集》的启发。列出的名单大概涵盖了二十几位著名学者，印象深刻者有南阳籍文史学者冯友兰、冯沅君兄妹，考古学家徐旭生、董作宾；平顶山籍诗人徐玉诺；信阳籍历史学家刘盼遂；许昌籍历史学家姚从吾等。当时的设想是已经出版过文集或全集者，可以通过购买版权等形式纳入本系列；没有出过集子者，则找人主编。董作宾先生的文集已有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繁体字版，后又联系到董作宾之子董敏，由他提供了一部分未曾收入或在海外新发现的一些书信等文献，并尝试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终因种种原因而搁浅；姚从吾先生的大部分著作，也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购入。随着人事变动等主观原因，此项“宏大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留下诸多遗憾。

所幸的是，在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努力下，一些豫籍学者的学术成果以文集、全集等不同形式陆续在不同的出版社得以面世，同时，其学术生涯、个人经历也以“年谱”或“年谱长编”等形式与读者见面。比如，十五卷本的《陆侃如冯沅君合集》2011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刘盼遂著述集》于202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与辽海出版社联合出版；《刘盼遂年谱》紧随其后，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24年刊行；2024年，《张伯驹年谱长编》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和文心出版社联袂推出。

对豫籍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徐旭生年谱》则由大象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面世。本文拟对该书予以简要介绍，以弥补作为出版人的一个遗憾。

《徐旭生年谱》由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礼先生担任主编。徐有礼教授在郑大历史系任教有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河南地方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另外两位作者均为年轻学者。其中，赵海涛是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谭玉先是河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长于文献整理，具有较高的文字把关能力。

专业的作者队伍是《徐旭生年谱》高质量完成的基础，对乡贤的尊崇、专业知识的积淀、文字把关能力的过硬是《徐旭生年谱》高水平出版的保证。自2020年10月与大象出版社达成写作、出版徐旭生传记的意向开始，徐有礼教授即将此年谱作为“附录”写作纳入整体出版规划之中。今次《徐旭生年谱》的出版，可谓“主书未出，附录先行”的一个典型案例。为完成此项写作计划，他还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四步走”计划：一是通过实地走访，考察相关地域及相关人物；二是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三是先行写出样稿，讨论通过后再继续正式写作；四是明确三人各自的分工与合作要求。

其间经历了众所周知的三年疫情及郑州“7·20”百年不遇的暴雨袭扰，外出考察的计划屡屡扑空，网络收集资料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2023年春夏之交时节将成稿交由大象出版社。

徐旭生（1888—1976），河南唐河人，名炳昶，笔名虚生、遁庵、四河人等，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是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因其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对其夏代遗存的认定，成为考古学界公认的夏文化研究奠基者之一。

《徐旭生年谱》一书是迄今为止学界第一部系统整理徐旭生人生事迹的编年体著作。归纳起，该年谱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第一，以编年体的形式详尽还原谱主的生平事迹，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谱主自出生到去世整整88年的成长轨迹。其求学、任教、管理高校、参加社会活动等脉络，巨细靡遗，充分展示了徐旭生与中国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成长历程，对其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一一收入谱中。如早年就读京师译学馆法文科、负笈法兰西留学巴黎大学，回国后任教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北京大学教授兼哲学系系主任、教务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受聘中山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

第二，尽可能地将搜罗到的各种文献资料，举凡图书、期刊、方志年鉴、报纸、传记、年谱、书信、日记甚至纪念专刊、内部资料等，细大不捐，悉数收入研究资料中。经过数个冬去春来，日夕披

乡邦文献研究的新成果

——《徐旭生年谱》评介

马达

览，孜孜不倦地在众多文献中爬梳剔抉，挑选出有用的信息，经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选取可靠者择善从之，终于写出这部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经得起推敲的编年体年谱。

第三，详略得当。对于一般性的日常生活，尽量择其要者记之，常常是寥寥数语，甚至是一笔带过。为了表现谱主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则不惜版面，详细说明，甚至会引用大段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比如，该书第88页记录1926年6月6日这一天的活动内容：在定府大街东公教大学花园参加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大会，……继胡适后，作关于整理国故的演讲。这一段文字很长，大约有一千字，全文照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第1

卷第1号。

再如，第276页至277页记录1947年8月1日之两件事情。其一，发表《论教员的进修问题》，约200字；其二，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评答赵光贤、王钟翰两先生》（上），署名“徐炳昶”。文章介绍了开始研究古史传说的过程及基本思路，肯定了赵、王二人对有关问题的质疑和“不敢轻信，是知识界中一件很好的现象”。阐明自己关于古史研究的基本认识，并答复两先生：第一，“世界任何古民族的历史起头全是由传说开始的，并不是中国古代特别如此”；第二，“传说部分总不免含有矛盾或难解的地方，它的来源全不够清楚。……将来能有地下物的证明固然更好，即使没有证明，只要没有反证，也只可暂时认为‘满意’”；第三，“现在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虽说作的差的还太不够，可是总算已经有了一些，我们作整理文献工作的时候就竭力注意”，使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印证。

第四，兼具及与作者交往的同时代著名人物的学术活动，可以作为其他领域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谱主徐旭生出道较早，学术起点高，交往者学术地位、层次较高，除有乡谊者，如冯友兰、董作宾，有同窗之谊者，如齐大壮、李宗侗外，其他如胡适、陈寅恪、梁漱溟、鲁迅、顾颉刚、黎锦熙、马衡等学界巨擘均有往来，与他们的交往细节在本《年谱》里得以清晰地表达与展示，可以作为“信史”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考使用。

《徐旭生年谱》以30余万字的篇幅，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爬梳了谱主徐旭生一生的成长履历和学术轨迹，充分展示了徐旭生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丰富多彩的一生行状，对其忧国忧民、积极参与政事的一面也多有涉及。

对于徐旭生在重大时间节点中的重大事件尤其不惜笔墨，着重用力。一是1927年徐旭生作为中国方面的负责人，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联合主持著名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此次考察终结了近代以来外国探险者在中国随意盗取文物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平等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模式；二是在考古学领域内的重大贡献，包括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以及对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掘；三是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代表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成果，该书对上古传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科学分析，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至今仍被学界重视且时常引用。此外，他积极参政议政、政治思想上追求进步的事迹也在本《年谱》中得到良好呈现。

这些鲜明的特色，足以让《徐旭生年谱》成为一本兼具学术价值和现代启示意义的优秀传记作品，值得推荐，俾更多的读者能够对这位豫籍学者的一生行状和学人风骨有更多的了解。

总之，通过这部《徐旭生年谱》，我们可以拓展阅读视野，对徐旭生先生的生平事迹有更好的了解和清楚的认识，可以立体多面地感知谱主独特的人生履历和鲜明的性格特征，知晓他既有浓郁宏大的家国情怀，又在学术上具有披荆斩棘、以启山林的厚重学养和巨大成就。同时，又会不由自主地对既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宽原直率，同时又融合了西方教育中豁达乐观人文精神的徐旭生先生充满敬意。

（作者单位：文心出版社）

躬行实践 立足前沿

——评《中国音乐考古学概论》

米永盈

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之时起，中国音乐考古学已经历了九十余载的发展历程，在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国音乐考古学概论》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界收获的又一份重磅论著。该书作者王清雷研究员在长期从事音乐考古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丰富的学术阅历，遴选大量音乐考古学理论成果与田野资料，按照构建学科理论框架的需求编排顺序，结合缜密思辨与严格实证得出真知灼见，并借助融媒体时代丰富多样的展示形式呈现给读者。

本书凡45万字，分为五章。第一、二章论述了学科定义、属性、研究对象、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做了分期探讨。第三章按照霍—萨乐器分类法介绍出土乐器类遗物，打破常见的以考古发掘单位、乐器材质或乐器名称等为分类标准的做法，将乐器的实际发音方式作为依据，把论述对象分为体鸣、膜鸣、气鸣、弦鸣四大类。第四章对图像类和文献类音乐文物以及其他类型的遗物与遗迹做详细介绍。第三、四章中分别设专节列举音乐文物发掘与研究时需注意的事项。第五章论及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职业操守与原则、工作内容与方法等。作者结合学界资深研究者的相关论述和自己的亲身体会，言传身教、丁宁周至。全书录入44段视频，420幅高质量图片，可谓精彩纷呈、图文并茂，读后令人感触颇深。

注重前沿 更新形态

本书在代表性音乐遗物基础上吸纳了许多新的音乐考古发现，例如陕西西安秦陵M1“北宫乐府”编磬，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编钟，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乐器、山西闻喜酒曲头商代编磬、山西隰县瓦窑坡东周墓乐器、海昏侯刘贺墓乐器、湖北枣阳郭家庙M30编钟、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口簧、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M3011乐器等。近年来与音乐相关的突破性考古发现一览无余，且许多资料是其他音乐考古论著中未曾收录的。这些新资料的面世以及本书作者对此提出的学术见解或研究设想将形成新

的学术热点，也为完善中国音乐史著作与教材的内容、更新中国音乐史研究与教学观念等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考古史料。

作者参考了大量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在书中做综述性或专门介绍，使读者对音乐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学术水平、重要学术成就以及相关学科中与音乐考古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研究结论形成全面而清晰的认知。在选用学术成果的标准方面，本书在注重权威性、科学性的同时亦秉承前沿性原则，所用材料截至2024年，有利于读者快速跟踪本学科研究动态。

本书采用新形态出版物的形式。书中收录的视频均为作者亲自采录，并配有字幕，读者可通过手机等设备扫描书上的二维码观看，借此了解相关考古学者、音乐考古学者的研究领域与学术观点，了解古代乐器实物的音响情况等。书中还附有相关电视节目、媒体微博等的链接，并提及哔哩哔哩等在线平台上古代乐器试奏视频被改编为电子音乐等情况，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多视角、富有新时代风貌的学术信息。

身体力行 谨慎笃实

书中所有图片都是作者亲自拍摄或严格遴选自权威性考古及音乐考古资料，图片品质精良，并附有清楚而周详的文物信息。为方便读者理解和配合学术探究，书中在许多音乐遗物的高清图片之外特制了局部特写图或拓片、线描图。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编钟出土情况、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陕西澄城刘家洼M2椁室、曾侯乙墓椁室等全景图，则带给读者亲临现场的震撼。在图片选择、应用方面，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作者结合文字陈述列举出土实物标本，一方面可辅助和加深读者的认知，另一方面借此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某些古代乐器的定名、学术观点阐述的准确度等问题作出自己有理有据的判断，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态度。同时，既结合自己在田野实践中收获的可贵资料展开对个别音乐文物的微观分析，又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和文化发展脉络中做宏观把握，以求建立不同音乐文物各自的断代标尺。书中阐述学科理论和工作方法的部分，作者反复强调文物安全问题、材料采录时的“一网尽扫”、乐器测音与文物试奏时的注意事项等。其高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音乐考古学概论》